

翻译:孔维锋 李菲菲 校订:吴新伟

KONG Wei - feng, LI Fei - fei, WU Xin - wei

“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 论文陈述摘要选刊^①

(按发言顺序编排)

[德国]戴莉亚·施哈塔

文化中的文化?美索不达米亚音乐中多文化现象考察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整个地区开始居住着数个不同的民族。最主要的民族有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后来其他的民族,包括伊勒姆人,胡里安人,阿摩利人等也很快跟进,他们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文化大熔炉。这些民族大多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音乐传统,而这直接导致了外来音乐实践的交流和兼收并蓄。

现在,无论是音乐或音乐实践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图像和文本证据追溯音乐传入的过程。尤其是通过文本证据,我们可以获得数种乐器和歌曲名称的信息,因为它们直接联系到某个外来的地名、地区或特定的城市名称。此外,还看到音乐家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旅行的踪迹,他们与邻国的音乐家交流音乐知识。

除了通过重要考古实例来讨论这一现象,我演讲的最后将讨论一下方法论。考虑到音乐研究中的互换性,我的讨论将涉及到现代调查方法,和对整个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进一步认识。在我的演讲中,我将针对现象,为与会者展示多方面的考古资源,而这些现象可能都是

由于音乐中文化多元性造成的。

[中国]方建军

发声器、前乐器、乐器与音乐考古学研究

众所周知,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乐器,但对于音乐考古学家而言,乐器的概念则较为宽泛。其实,乐器只是发声器的一部分。总的看来,发声器可以分为两个类别:(1)今天容易辨识的乐器;(2)今天不易确认其音乐功能和用途的发声器,如形似哨、笛、鼓等的人工制品,日常生产生活工具,以及一些仪式用品或装饰品。

我考虑将发声器分为三种类型。A型:包括前乐器、非前乐器;B型:玩具乐器。C型:包括乐器、明器乐器。本文将对从发声器中辨识乐器的方法加以讨论。

[美国]萨拉·B. 巴伯/[美国]盖伊·大卫·赫普

墨西哥瓦哈卡海岸的古代管乐器:音乐的考古语境与社会语境

如果书面记录有限或不可用,古代音乐的社会背景是非常难以理解的。这就是位于太平洋海岸墨西哥瓦哈卡州的低地里奥贝尔德流域的情况。在公元500年以前,这里没有文

^① 此次刊登的摘要均选自论文陈述(此外还有海报陈述),其中大陆地区学者的摘要为作者本人提供。刊登的摘要按照发言顺序排列。

字,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才在六个古抄本中发现星星点点关于音乐的书面讨论。然而,考古发掘发现,在公元前400年初,这里就已经有陶制和骨制古管乐器存在了。然而,对这些乐器的生产、使用和丢弃过程进行解释却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书面材料记录和考古实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距,而且这些古抄本的记录者与考古发现的乐器的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民族和社会地位的极大差距。古抄本是由讲米斯克语的社会精英所撰写的,记录了王朝的历史和家谱。而大多数考古发现的乐器,则是讲查提诺语的平民家庭或仪式使用的废弃物。因此,虽然古抄本对于了解前哥伦布时期本地音乐来说是宝贵的资源,其他的证据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先前未报道的乐器考古发现,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50年之间。我们结合考古人类学和人种历史学及图像学的方法,初步考察古代瓦哈卡沿海音乐的社会意义,并发现仪式在音乐表演和观众形成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土耳其]泽伊内普·海尔瓦哲

小亚细亚双管乐器的故事:历史与现状

众所周知,小亚细亚的双管乐器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经存在了。根据图像研究和书面证据,双管乐器在希提人的典礼和仪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也是弗里吉亚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乐器后来称为“奥洛斯管”(aulos),这是按照古希腊文命名的。对于双管乐器在罗马时代的发展,目前少有探讨。但是,从那时起,类似的乐器一直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使用,目前在现代土耳其各地区仍在演奏,只是叫法各不相同。

本文的目的是探寻古双管乐器在整个小亚细亚的发展历史,甚至包括当今的使用情况。乐器的发展既包括了乐器制造和演奏技巧的发展,也包括了其功能和文化层面的演进。由于研究主题的需要,本文也讨论了音乐考古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类比法。

[瑞典]卡伊萨·S. 伦德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史前时代的疑似打击乐器:质疑与难题,理论与数据

本文将侧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史前

史,大约涵盖12,000年的历史(或360代人的历史),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较短的时期。我们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史前人所发出的声音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对乐器和其他声音产生工具的考古发现,包括完整文物或文物碎片。我把这些文物分为两种:一类是确认的乐器或发声工具,另一类是可能用于发声的工具,但其发声功能可能是其主要或次要功能。在本文中我将介绍和讨论疑似的打击乐器。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瑞典西部Frösunda发现的17个青铜盾状物,约形成于青铜时代晚期。其直径大约60—70厘米,非常薄,大约在0.3—0.5毫米。它们的几个特点使我们排除了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的盾牌的可能。一种假设是这些盾状物可能在仪式中用于发出声音,我将对此进行具体论述。此外,还将讨论斯堪的纳维亚响石。这些响铃石是自然形成的石块或石板,敲击时能发出金属声音,并有证据证明史前人类将之作为打击乐器使用。

[中国]郭树群/[中国]孔维锋

中国古代量音技术索隐——对中国音乐考古学史一个基础理论概念的思考

中国古代量音技术实践渊源久远,远古时代的舞阳贾湖骨笛,其后曾侯乙墓出土的均钟,见证着这一技术的历史存在。中国古代量音技术的音高标的物是长度;其基本音高规范是自然谐音列;其基本工具是量音器。上古经验性量音技术的基本内容是对谐音音频的把握。谐音列相邻两音间自然真数的等差序列特征,成为经验性量音技术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这种经验性的量音技术对后世应用律学体系的影响是琴律、钟律和笛律;以及以等差观念影响到的理论律学调律方法。中国律学史上主要的调律器有均钟、京房准、荀勖笛律、梁武帝“四通”、陈仲儒准、王朴律准、朱载堉弦准。中国古代量音技术的重要历史文献见于《管子·地员篇》、《淮南子·汜论训》、蔡邕《月令章句》、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以及崔尊度、沈括、陈旸、朱长文、徐理等宋代琴学理论。对于中国古代量音技术展开研究的中国当代音乐学人主要有赵宋光、黄翔鹏、以及孙克仁、应有勤、陈其射、孔义龙等。

[德国]拉尔斯·克里斯蒂安·考赫

作为地位象征和研究对象的弦乐器:印度王公索林度·莫罕·泰戈尔爵士的案例研究

自19世纪下半叶,印度王公索林度·莫罕·泰戈尔爵士作为音乐学家,致力于印度音乐和音乐史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标是使印度音乐与西方音乐具有同一的学术高度。他用西方记谱法记录印度音乐,并收集了西方学者研究印度音乐的所有论文,研究了印度音乐的不同层面,并将研究成果通过30多本专著发表出来。

为了证明印度音乐的价值,泰戈尔王公收藏了所有的印度乐器,其中既包括标准的乐器,也包括纯粹的装饰性乐器或者古乐器,还包括为音乐学研究制作的乐器。他把所有这些乐器带到世界多处博物馆展出,包括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这些收藏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从来没有被演奏过,或再没有按照这种形制制造过,但它们流传了下来,并在20世纪主导了西方对印度音乐的认识。

[中国香港]杨元铮

黄金时代古琴的类型学分析

东亚音乐文化中的乐器学与其他文化中乐器学的不同在于,它对琴筝类乐器赋予极高的地位。因其历史悠久,中国的古琴从唐朝(618—907年)起,一直发展到今天。然而,这些音乐文物,虽然可能比斯特拉迪瓦里早了一千年,但目前对它的研究,还仅限于其外部特征,如木材的选择,漆的性质,以及表面断纹的模式。这种直接影响音质的内部结构设计的古琴充满了神秘色彩。史密森学会的一项研究,将计算机辅助断层扫描技术应用于音乐考古,对古琴进行了数千次断层扫描。利用这些扫描图像,可以重建原件的三维图像。将这一技术用于不同时代的古琴样本,将建立一个历史乐器数字数据库,这不仅可以将这些宝贵文物的现状保存下来,而且可以对过去一千五百年以来制琴技术的演变进行系统化的梳理研究。本文着重以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F1915.100)的古琴为例,展示如何通过断层扫描进行类型学分析。

[挪威]吉尔穆德·科尔特韦特

传统:介于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音乐考古学

本文基于音乐考古史料,将在广泛意义上研究和探讨有关传统的一些问题。比如骨笛,既是有限的地域范围和历史范畴的乐器制造和音乐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跨越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一个具有对比性的例子是犹太人的竖琴在欧洲的发展情况,它在12世纪出现后迅速发展。要了解它的普及,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其创新而非传统。这种乐器在整个欧洲都很流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两种乐器都作为传统乐器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

一些现代乐器是基于悠久文化的传承,而另一些则是新的,甚至是“发明”的。有时这些乐器是根据考古学发现和数据重构的。音乐考古学家的作用,是对那些旨在重现古乐氛围的现代音乐阐释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它们往往成为这类现代音乐实践的核心部分,以保证古乐重现的“真实性”。音乐考古学家如何才能游走于现代音乐实践和传统之间?

[芬兰]丽塔·雷尼奥

权力、魔力和铃:芬兰铁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发现的语境分析

数百计铃、响铃及铃状垂饰的出土,证明芬兰铁器时代中晚期(公元600—1200)是一个“铃儿响叮当”的时代。在本文中,我将试图探讨这种声音的意义——以证明为什么铃在当时如此受欢迎或有用。我论证的前提是基于:铁器时代的研究结果,作为一个整体,将提供研究古代思想模式的机会。土墓、冢、公墓、储物处及住所遗址等发掘出的文物,都可以形成关联性的集合、规划和结构,而通过民族志类比,其含义是可以解释的。以一百多份研究报告为基础,可以证明在当时,这些铃、响铃及铃状垂饰原本是挂在衣服和马鞍上,或用袋和箱子携带的。所产生的声音也可能用于构建社会等级制度,因为这些乐器往往只出现在有大量陪葬品的坟墓里——含有贵金属和外来器物的坟墓。此外,这类乐器通常会出现在十字架,微缩武器或兽形垂饰上,而在后来的芬兰卡累利阿文化中,这都被视为是神奇的护身符。在铁器时代以及后来的民俗文化中,铃声似乎都表达着社会等级、宇宙理念或领土边界等信息。

[德国]阿德·阿德加·博特

墨西哥特奥蒂瓦坎的音乐、声音和文化

在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约公元前150年~公元550/700年)考古发现中,与音乐相关的发现主要有陶笛、口哨,哨罐,海螺号,陶制管状号,和骨铎等。另外,绘有乐器、音乐表演者和声音的各种壁画也被保存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特奥蒂瓦坎的音乐和乐音在社会文化意义和功能方面的信息。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发现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音乐考古学分析。2008年,一项以保存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研究实验室和“Ceramoteca”的文物为基础的音樂相关调查在特奥蒂瓦坎进行。所有记录在案的乐器(基本上以“特奥蒂瓦坎测绘项目”和最近的发掘为基础)和壁画都进行了分类,然后生成分布图,揭示了特奥蒂瓦坎文化中音乐和声音的更详细的风貌。本文将展示目前所做研究的初步成果。

[荷兰]安奈米斯·J. B. M. 坦博尔

世界最古老的风笛和最近自荷兰发现的风笛

大约一百年前,在荷兰布莱亚的特普土堆发现了一个木制管笛,当时被命名为“木制管”。2006年,在我所称之为《初步报告,或进行中的工作》的报告中,我提出,这个发现无疑是一个风笛的笛管。现在,随着新数据的出现,很可能可以断定,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残存的、最古老的风笛遗存。

大约在五十年前,根据现在无法验证的旧数据,以及其风格特征(因其“Kerbschnitt”纹饰),将这一文物的定位在公元8至10世纪。现在,我希望在进行碳十四测定后,能确认它的年代。这将是壮举,因为据我所知,没有其它已知的风笛可以不容置疑地追溯到公元8至10世纪。另一个壮举,是由比利时风笛制造商雷米·杜波依斯测量的新数据:他发现布莱亚笛管不是圆柱体,而是圆锥体的。让·皮埃尔·凡·希斯正在进行一项研究,以证明这一文物是乐器的可能性,以及其对欧洲风笛史的意义。他还将演奏以考古新发现重构的布莱亚乐器。

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发现是近年在荷兰

发现的风笛。这是一个风笛的笛管部件,发现于乌得勒支的回廊建筑里,与另外一个于1634年沉没于瑜尔弗斯比尔北德惠苏姆海岸附近的荷兰沉船上发现的笛管有相似之处。出人意料的是,乌得勒支发现的文物要早约两个世纪,其年代大约在1450年。这对于欧洲中世纪风笛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非凡意义。

[比利时]让·皮埃尔·凡·希斯

在荷兰考古发现的风笛部件对欧洲风笛史的重要意义

近来在荷兰发现的风笛部件对于研究风笛家族乐器在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出乎人们预料,现存最古老的风笛部件,并非像最早文献中所提及的那样发现于地中海。这次发现的有孔圆锥体笛管,似乎应该配有双簧片而非单簧片——明显与现有关于风笛早期阶段的认识相背。在我研究风笛特定演奏技巧历史的过程中,采用布莱亚风笛进行乐器复制将会成为一个关键时刻。

乌得勒支发现的风笛笛管是圆柱体,具有窄孔,其年代大约在公元1450年,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带有双簧片和窄圆柱形孔风笛发展崛起的理解,后者形成于16世纪。乌得勒支风笛是著名的法国穆塞特小风笛(这类风笛具有典型“monoxyle”低音结构)和英国诺森伯兰“小管”的最早鼻祖。虽然这种风笛类型在欧洲中部和东北西部的无数图像学资源中屡见不鲜,但乌得勒支和瑜尔弗斯比尔(北德惠苏姆)的例子,是欧洲这一地区风笛唯一现存的实例,这类风笛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盛极一时,具有甜美的声音。由比利时风笛制造商雷米·杜波依斯根据以上文物重制的两件乐器,将向我们展示它们美妙的声音。

[中国]李玫

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意外的惊喜

《吕氏春秋》(约成书于前239年)和《淮南子》(约成书于前140年)是两部重要的乐律学文献。它们记录了先秦至汉的十二音计算方法和知识。前者只有生律方法而无具体数据,后者延续这个方法并计算了十二音的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于生律方法不尽相符。通过分析,可以解释《淮南子》中所呈现的这个矛盾,

其实更符合书中所阐释的哲学观。过去我们认为在自先秦以来浩繁的乐律学文献中,这组数据是个孤例,1985年发现的天水放马滩秦简(于前239年随葬),则不仅为淮南律数提供了更早的源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拥有的乐律学认识。

[中国]邵晓洁

出土楚公逆编钟的音乐学研究

楚公逆钟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重要楚青铜器之一。早在宋代,湖北嘉鱼太平湖就出土过一件楚公逆钟,但实物已佚,仅存铭辞拓片。20世纪末,考古人员在山西晋侯墓地发掘出土了8件成组的楚公逆编钟。这组编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楚编钟。2007年6月25日至30日,笔者与王子初研究员等在晋侯墓地的主要发掘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的带领下,一同远赴山西实地考察和检测了晋侯墓地出土的所有乐器,其中,对楚公逆编钟进行了全面测音、测量和记录。本文即是以科学测定的数据为依据,对这套编钟的组合形式、音乐性能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与研究。

[法国]让·卢普·林格

史前气鸣乐器:是笛还是管?

在比利牛斯山脉和东欧出土了几件带有音孔的史前鸟类的骨骼和象牙管的文物。这些管通常被称为“笛”,但这些文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而且,它们都不具备作为笛类乐器必不可少的部分:唇片,以及在笛管内部引导气流流动的边棱。

这些管可以像盖纳笛一样侧吹,但是这种演奏方式相当困难,而且并非在演奏任何音乐时都适用。2008年在霍赫勒·费尔斯洞穴(德国西南部)发现的管几乎是完整的,并可能有助于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气鸣乐器有四个完整的孔和一个不完整的孔,而且一端末尾有一个长的倒棱。这个倒棱看起来像单簧管的末端,表明这里应该安置一片哨片。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中部不出产竹子或芦苇,但是用桦树皮也可以制作出很好的哨片,这已经通过实验验证过。我们用同一类型的骨(秃鹫桡骨)制作了气鸣乐器。这个

仿制的管声音响亮而和谐,而且容易演奏。通过调整桦树皮哨片的大小和厚度可以对它进行调音。

[斯洛文尼亚]斯凡尼伯·派坦 / [斯洛文尼亚]柳本·狄姆卡洛斯基

再看旧石器时代的迪维·巴贝骨笛

1995年考古学家伊凡·特克在斯洛文尼亚的旧石器时代洞穴迪维·巴贝发现了有孔的幼熊腿骨,此后几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努力研究其可能的音乐意义,并撰写了著作。近几年来,关于其是否具有乐器的性质,研究观点是众说纷纭(如 Omerzel Terlep 1998, Chase and Nowell 1998, Kunej and Turk 2000, D'Errico et al. 2003, Horusitzky 2003, Morley 2006),而后这一问题在学术圈和媒体的关注中逐渐淡出。

2009年,音乐家兼乐器制造商柳本·狄姆卡洛斯基重新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使迪维·巴贝“笛”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一研究得到了考古学家伊凡·特克和民族音乐学者斯凡尼伯·派坦的协助,其研究成果于2009年11月在卢布尔雅那国立博物馆的特别活动中公布。本文公布了新的证据,包括实验及前人(匿名)学者提出的演奏方法;本文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寻求答案,为这个十年前热议的学术辩论略尽绵薄之力。

[波兰]多罗塔·波普拉夫斯卡

波兰出土的中世纪弦乐器

波兰共和国领土上发现了六个弦鸣乐器,有三个北部里拉琴(两个在奥波莱市,一个在格但斯克——“渔民的定居地”),两个小提琴(一个在依布拉格的渔民定居地,另一个在普沃茨克市)和一个吉特恩琴(依布拉格市)。这些乐器中最早的大约制作于公元10世纪,最迟的大约制作于公元16世纪上半叶。在波兰和欧洲中世纪的图像志资料中也存在这些乐器的一些例子。

每件乐器都得到较好的修复。这使我们可以认真研究并描述这些文物。这些弦乐器的琴身都是从整片木材(不同类型的木材)中雕出。平坦的琴腹是抛光的云杉或松木。其中三件乐器(两部里拉琴和一部吉特恩琴)有

一些适度的装饰。最老的一部里拉琴还发现了马毛做的琴弦碎片。这些里拉琴有两至五根琴弦,小提琴有三至四根琴弦,而吉特恩琴有八根琴弦。琴弦的固定方式各不相同。

除吉特恩琴是在依布拉格富有的市民家庭发现(出土)的以外,其余的弦乐器都是从波兰朴实的农民聚居地发现(出土)的。通过琴身上的某些痕迹来看,其中有五件乐器可能仍在使用中。

[日本]荒山千惠

日本出土的弦乐器: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弦乐器面面观

在日本列岛,有超过100多件弥生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和古坟时代(约公元3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弦乐器出土。由于参考文献和历史文献的描述非常稀少,这些考古发现对于日本弥生和古坟文化时期的乐器发展和文化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材料分析,介绍了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弦乐器的某些方面。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对弦乐器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以下要点:

- 1)弦乐器特性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 2)类型的过渡:共同点和不同点;
- 3)形制特征和构造工艺的区域特征。

[俄罗斯]维罗妮卡·美施克里斯/[俄罗斯]弗拉基米尔·A. 马莫诺夫

中国唐代与中亚邻国音乐文化的相互作用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现象。中国东西部墓碑研究:Chang-te-fu(张德富?)和美秀博物馆展品。

通过与中亚音乐考古文物的对比,研究中国浮雕的研究方法。

这些浮雕的主要风格特点是:多人物的细致刻画,人物重复动作的静态和动态活动,以及传统场面的规约性。

中亚地区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反向影响是未来研究者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在阿夫拉夏

卜的壁画实例中有这样一个主题,外国来使由演奏弦乐器——可能是中国琵琶和另一种拨弦乐器(琴)的女乐官所陪伴。这种文化迁徙的影响在远东的片治肯特(Panjikent)尤为明显:一方面描画了中国女乐官,另一边是不常见的“形声字”作为当地女神的特征。该乐器是一个框架形器具,中间用中国特有的方式悬挂着一个小铃。

音乐考古学的数据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和中亚的文化艺术交融现象提供了稳定的基石。

[中国]王子初

粗陋的珍宝——江苏常熟博物馆所藏完颜璫编钟辨伪

江苏省常熟博物馆所藏3件编钟,据其铭文为元代儒学完颜璫所铸。研究表明,所谓完颜璫编钟、包括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平江路儒学中吕钟和嘉定儒学钟,均可能为清人所作伪器。这些乐器所作的时间、地域,乃至作伪的人群相去不会太远;不过,它们虽是伪器,但不是“伪文物”;因为对于今天来说,它们仍然不失为一批有着较深历史底蕴的清代文化遗物,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美国]英格丽·弗尼斯

和林格尔县的宴会和“娱乐”场面:再现北部边境地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

宴会、音乐和“宴饮百戏”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②在东汉墓葬中屡见不鲜。因此,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公元2世纪的一个高级军官彩绘墓中发现这些主题并不奇怪。公元1世纪,汉朝的军事力量已经延伸到该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的是外族民族,特别是乌桓族。这些民族的居民在汉朝军官的监管之下,不仅成为汉朝的亲密盟友,而且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已经成为汉朝边境忠诚的保卫者。

鉴于汉朝与乌桓之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文化交流。然而,通过对和林格尔墓壁画的细致研究,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以墓中壁画

^② 校订者注:中国历史学界对于汉朝的时间界定与作者有所出入,国内历史学界认为西汉开始于公元前202年,一直持续至公元9年;东汉始于公元25年,至公元220年灭亡。

中的宴会和“宴饮百戏”作为研究中心,我的论文将探讨以下问题:与中原和江南地区同时代的汉墓相比,壁画中进行相同活动时的主题有何异同;在与北部边境地区交流过程中,宴会和娱乐对于维系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有何意义?通过审视一名汉族官员如何通过其墓葬文化体现其文化认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汉人在边境地区如何适应非汉族文化。

[中国]王友华

先秦乐悬中镈的编列分析

青铜乐钟的编列是讨论先秦乐悬无法绕开的话题。本文对出土先秦镈的编列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将其演进历程分三个阶段: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镈的编列常制为3件;春秋中期,镈的编列常制扩大为4件;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4件组编列常制依然存在,但编列的多样化趋势明显,除4件组编列外,还有9件、8件、6件和5件等编列形式,其中,中原地区的编列形式主要为4件、8件以及9件。5件、6件等编列形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的齐、吴越等地。

[中国]王清雷

长安马王村编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

1973年5月,陕西省长安县马王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了一套编钟,共计10件,原断代为西周中期。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详细介绍了这套编钟的相关资料。2005年,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通过对其测音数据分析后发现,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但是多年以来,这套编钟一直处于被音乐学者遗忘的角落。本文运用音乐考古学、器形学、音乐声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这套编钟作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与研究。

[中国]孙晓辉

迦陵频伽的音乐属性阐释

迦陵频伽是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丰富象征意义的佛教音声符号。本文试图解读迦陵频伽图像的风格、流变、传播和象征意义,并对这一音声图像的音乐属性做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迦陵频伽”(梵语 Kalaviyuka,或译为妙音

鸟)本是产于南亚、东南亚的一种卷尾科鸣禽;早在佛陀时代,就以其自然妙音入选佛教教义和经典,成为譬喻佛法音声的化生神鸟;在传教东传的过程中,它逐渐以人头鸟身的形象成为西方极乐净土世界中的礼佛乐伎,活跃在唐代佛教经变壁画中,成为净土信仰的艺术符号;这一艺术符号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佛教建筑、雕塑作品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世俗受众欢迎的装饰纹饰;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以后的迦陵频伽造型逐渐演化为集迦陵频伽、飞天、紧那罗等多重乐神为一体的音乐之神;当迦陵频伽从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传到终点日本国的时候,其音乐属性更加彰显,迦陵频伽已经上升为乐舞艺术和职业音乐家的代名词。

[法国]西尔万·佩罗

希腊奥洛斯管的声音:古希腊和小亚细亚之间的音乐关系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确认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希腊木管乐器演奏何种音乐。根据我用奥洛斯管碎片建立的数据库(这些奥洛斯管大多数是在教堂庇护所发现的,还有一些发现于坟墓和贸易场所等),最古老的乐器是奉献给女神赫拉,雅典娜和阿尔特弥斯的,还有为数很少的是献给闪灵神,普西芬尼和卡比里的。

这三位女神,特别是阿耳特弥斯,非常喜欢奥洛斯管的声音,而且她们拥有由年轻处女组成的合唱团。根据文字证据(我即将对此进行评论),他们的歌曲应该主要包括两个调式:弗里吉亚和爱奥尼亚(也称为 Iastian)。因此,这种音乐表演可能是从小亚细亚引进到希腊的:卡比里是犹太人的神,而锡贝尔勒(弗里吉亚伟大的生育女神)是与音乐崇拜有关的。众所周知,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在古老时代是像锡贝尔勒一样的生育女神,她可能曾到过希腊:斯巴达 Orthia 的阿尔特弥斯,以及阿提卡 Brauronia 的阿尔特弥斯,是阿波罗的妹妹,但更多地被认为是亚洲的生育女神。因此,通过文字和历史遗物的证明,我们可能希望了解古代希腊的奥洛斯管是否与原本属于亚洲的音乐之间存在技术上的联系。但希腊音乐已经经历了多次变化:从古典时代起,大部分的奥洛斯管都是献给阿波罗的,这是由在特尔斐发

现的文物碎片所证明的(我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西班牙]拉奎尔·吉门尼斯·帕萨洛多斯

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青铜时代石柱上的乐器

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石柱是了解青铜时代晚期社会非常重要的来源。然而,对于其编年史和文化定位的研究,目前学者尚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在武士的盔甲和代表威望的信物上面,常常出现如里拉琴、克劳特尔(crotal)和卡可风(calcephone)之类的乐器。里拉琴的起源目前依然是学者辩论的对象,这取决于采用西班牙前殖民和殖民世界的特定视角。

然而,通过乐器学的深入研究,就可以解答石柱的形成年代及文化涵义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乐器的形态学和背景方面区分这些乐器,同时还将讨论音乐活动的归属。我们亦会建议与地中海框架进行类比,试图澄清其可能的文化渊源。

[英国]西蒙·怀亚特

敲击式和非敲击式音乐器物:识别史前欧洲鼓

民族志认为,鼓是地球上几乎每一个文化中都存在的重要乐器类型。“Trichterbecher”文化(TRB,漏斗杯文化)出土的陶质器皿被认定为鼓,对于欧洲来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因为这是欧洲史前史里唯一一件被普遍认同为打击乐器的文物,当然在更广义的 TRB 文化分布区也可能还存在类似的物器。我们目前有三条思路可供选择:一是在北欧,鼓只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才发展起来;二是在此之前或在其他地区,鼓类乐器早已存在,但它是用易腐物质制成的;三是还存在着某些种类的打击乐类乐器,但目前我们尚不把它们解释为鼓类乐器。

在 TRB 文化中,还有一些陶器的形式,与已公认的鼓不属于同种类型,但目前被暂定为鼓的某种形式,且存有争议。同时,在 TRB 文化分布区以外,也存在着一些文物,与 TRB 鼓的形制和形态相似,但并不作为乐器来认定。此外,这类文物还可以追溯到它更早的存在形式,可能是木制器皿,而在中国,与之相似的陶质和木质的样

本都曾被发现。本文将探讨在 TRB 南部和其他欧洲史前文化集团发现的不明器物的证据,来证明它们是否可以被看作为人工制品,或岩石艺术,或是与之有关联的文物。

[德国]拉尔夫·马丁·耶格

Hindiler — 17—18 世纪土耳其帝国音乐手稿中的印度音乐痕迹:在跨文化背景中传统、音乐结构和身份

在大约 1650 到 1720 年间,土耳其帝国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导致了今天认为是经典的艺术音乐文化的产生。对于外国音乐文化的深刻兴趣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目前存留的极少数来自于当时的手稿包含了一些波斯语(Acemler)或是阿拉伯语(Arablar)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被称为源于“欧洲人”(Efrenciler)。不过,留下历史痕迹的不只是土耳其帝国和其周边的音乐文化。让人非常感兴趣的是一些匿名作曲家的作品,这少数的作品在能获得的材料中被称为 Hindiler(印度语)。

本文将检视历史作品的音乐结构,并按照音乐理论和文化历史背景对它们进行分类。另一个重点在于将土耳其帝国曲谱和印度音乐在莫卧儿时代——Akbars (1556—1605)死后——使用的基本度量规范对应起来。通过将 Hindiler 与近东正式的结构化的艺术音乐相比较,我们不能确认跨文化迁移的存在,也不能确认历史上的亚洲音乐文化在东部和西部具有可比性。在奥基曼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对印度绘画和建筑的接受中可以看到丰富的相似性。

[奥地利]斯蒂芬·海格尔/[波兰]奥尔加·休特考斯加

对庞贝“提比耶(Tibiae)”碎片的解析

作者对这些古老的管乐器(即“庞贝管”)的碎片进行了分析,它们来自希腊化时期意大利的火山地区。目前,这些碎片保存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Naples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迄今为止,其中还有一部分未曾被研究过。显然,该乐器属于种类较少的双簧双管气鸣类乐器(例如希腊的“奥洛斯”,罗马的“提比耶[tibiae]”)——该乐器曾在古

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流行。

我们认为其精致的结构以及一种特殊的机构原理,明确证明这是由专业演奏大师所使用乐器。文章从乐器学角度描述并分析了这些碎片,比如其属于左手执管还是右手执管类,管体上指孔的布局等;其机构原理的细节可以引导我们在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时代早期皇室音乐的框架内,对其音调做出评论和阐释。

[美国]蒂莫西·J·摩尔

荷兰 Eelde 镇的奥洛斯管

位于荷兰 Eelde 镇的沃斯伯格博物馆(Vosbergen Museum)拥有两支骨质奥洛斯管的碎片,博物馆的主人迪克·维勒尔(Dick Verel)在20世纪70年代购得这些碎片,但从未公开。尽管产地和年代不能确定,奥洛斯管的设计还是表明它们源于早期,或者意味着它们仅为业余演奏者所使用,因为管体上仅有五个指洞。

六块碎片上都分别有一个约1公分的孔。其中两块几乎一模一样:它们是两支奥洛斯管各自的中心部分,这两块碎片上都有三个指孔,以及正面的四指指孔的上端部分和背面的大拇指指孔。其它三块碎片恰好能同这相似两块其中之一整齐地拼接起来。如果我们再把第五块加入进去,我们就可以还原出一支约35公分的完整管体。最有趣的是最底端的一块上还有两个通气孔。第二个通气孔的加入可能是为了影响管子的音调;而上面的那个孔有时可能会被蜡封住以使洛斯的音域稍稍降低。

尽管支离破碎且保存状况不佳,这些物证对早期的奥洛斯管的结构还是提供了新的线索。

[中国]王歌扬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乐舞百戏画像新考——兼论两汉时期礼乐制度的演变

1954年3月到5月,华东文物工作队与山东省文管会组队,发掘了沂南北寨画像石墓(简称沂墓)。1956年9月,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了由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合著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书。《报告》对墓的地理环境、发掘经过、形制、结构、画像石内容进行了详尽介绍,并对画像石内容进行了考证。最后,对墓的艺术价值、年代作了评估和推定,从而,沂墓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汉画像

石墓考古的标型墓之一。由于墓的发掘、研究到出版之间时间的局限性,画像内容中“关于乐舞百戏图的考证”,部分较略,个别化像石组合有待商榷,现就飞丸跳剑、踏鼓七盘舞、伐鼓、撞钟、击磬、击铙吹排箫与埙、鼓瑟吹埙及竽等这一部分作一补正和考证。另外,就墓的年代、主人,以及与之相关的礼乐之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美国]德拉维克·布雷兹科维奇

查尔斯·伯内《音乐通史》中古代遗物的形象化

1773年4月,查尔斯·伯内在宣传他即将面世的新书《音乐通史:从远古时代到今天》时强调:这套书的图解将是“古代和现代乐器的原图,由最高水平的艺术家篆刻”。但是当此项目最终完结,全部四卷书目在1776到1789年间陆续出版时,只有讨论古代音乐的第一卷中有历史性乐器的雕版插图;之后的卷宗中则一律是由旅居伦敦的意大利艺术家弗朗西斯科·巴特罗兹(Francesco Bartolozzi, 1727—1815)雕刻的神话形象。第一卷中的三幅乐器雕版插图展示了大量的埃及、希腊和罗马乐器,由法国雕刻家皮埃尔·玛鲁佛(1740—1803)和英意混血雕刻家查理斯·格里格尼奥(Charles Grignion, 1745—1810)创作,查理斯·格里格尼奥是古董复原方面和创作大型历史作品的专家。它们或取材于伯内在其1770年意大利之旅中有机会见到的考古遗迹,或来自期间的出版物资源。在接近古代乐器的可视化资源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伯内一直在近期考古研究的影响与1738年在赫库兰尼姆及1748年在庞贝的发现之间进行着平衡,这在对古代资源和将古代音乐同神话故事相联系的悠久传统的呈现过程中,重振了追求历史性精确度最前沿的渴望。本文将分析伯内用于展示古代乐器的考古学和图像学资源,以及他接触这些材料时所采取的方法论。

[意大利]安东涅塔·普罗文萨

古代希腊乐器及其起源:文学作品与图像中音乐神话展示的暴力与文明

在古希腊充斥着暴力的大画面中,本文根据一些涉及到的乐器的起源,聚焦于“根源”神话。

实际上,奥洛斯管就与暴力有关: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林神玛耳绪阿斯的“暴力”神话,还有珀尔修斯杀死美杜莎的情节(Pind. *Pyth.* XII)。另外,古代希腊人常常把管乐器与森林之神萨特——一个暴力且缺乏自制力的角色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神话人物因暴力而失去所爱,从而承受巨大的痛苦,有时也会成为音乐的源起(例如在切蓓莱《山脉和野生环境女神》或是绪任克斯女神《河神之女》的神话里)。

这些神话里那些对傲慢的惩罚和神赐的“正义”暴力拥护了音乐的教育意义和积极“价值”。

此外,那些看似缺失的方面可能实际上为新的变革打开了一扇门;这些情况当中的暴力就往往带来了一些改变,给文明增加了新的元素,为其此前对抗的东西注入了新的特质。

这样的暴力有利于将新元素带入到已有的秩序当中,从而促使了从“野蛮”向“驯化”,从“本我”向“自我”的转变。这一点也可以在这类神话的现象学解读中观察到。

[智利]约瑟·佩雷斯·德·阿尔塞

南安第斯山区对安塔拉的图像学研究

在南部安第斯山区,除了在阿塔卡马沙漠和阿根廷西北部地区的一整套图像,表现音乐的图像极其少见。这些图案聚焦于一种乐器(我们把它叫做安塔拉),提供了理解其社会和文化维度的重要线索。

在西班牙人占领之前的4个世纪里,图像被雕刻在“rape complex”的木制品上——萨满教用它来吸入活跃精神的粉末(参见吉里的海报陈述)^③。

本文将对如下方面做出描述:“安塔拉”的象征和那些在墓穴中发现的乐器实物;rape complex 和在葬礼背景中发现的其他乐器;图像的样式;古代安第斯人祭祀与猫科、美洲驼崇拜之间的关系。

这些主题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重现安塔拉在过去被使用的仪式背景。所有这些做法

都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现在安塔拉成为了文化范畴一个复杂体系的一部分(参见默卡多的海报陈述)。

本文将尝试解释安塔拉在古代的演奏方法,使用场合及传承。

[意大利]丹涅拉·卡斯塔尔多/[意大利]埃莉奥诺拉·罗克尼

大希腊时期(公元前400—公元前300年)红色人像花瓶彩绘中舞台上的音乐:音乐在所谓“菲力雅士瓶”中的角色

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大量丰富多样红色人像瓶在意大利南部发现。它们多出土于开掘的古墓当中,制于公元前400到前300年,证明了大希腊时期一段蓬勃且持续发展的戏剧传统。

“菲力雅士瓶”传统上是指在陶器上描绘一场非正式的即兴创作的地方滑稽剧,也就是意大利的“菲力雅士戏剧”,(相反,最近奥利弗·泰普林认为它们反映了西部希腊殖民地上演的雅典人古喜剧,见于他著名的《戏剧天使及其他透过花瓶绘画对希腊戏剧的研究》,Oxford,1993),本文聚焦于“菲力雅士杯”引人注目舞台上乐器的描绘。

为了解释说明这些器物,笔者将从考古(如果可能,因为毕竟这些材料的来源常常是“非法”的)和文化(塔拉斯市在古代历史方面以宗教庆典和其中的音乐、戏剧活动而著称)两方面对于当地环境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

[美国]马克·豪威尔

后古典时期玛雅基切族的音乐同化现象:从战士舞到殖民时代的摩尔人及基督教徒舞
危地马拉高地的玛雅基切族舞蹈,或称之为“拜莱斯”,是按主题(如祭祀,狩猎,或征服)分类的,而且往往每个舞蹈主题都有对应的标准伴奏乐器为之配对。这些舞蹈大多出现在后古典时期和殖民时代(公元1200年至1650年)。例如,一种舞蹈类型——祭祀主题舞,在当地被称为“tun”,是由无阀小号和/或缝鼓(slit-drum)^④伴奏,而狩猎主题舞,则由马林

③ 校订者注:学者阿尔塞(Arce)与吉里(Gili)、默卡多(Mercado)都是来自智利的学者,他们参加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在研究对象上有着密切关联。其中,阿尔塞为论文陈述(paper presentation),而吉里和默卡多为海报陈述(poster presentation)。

④ 校订者注:鼓身用树干制成,中空,通常用棍棒敲击,类似于木鱼。

巴伴奏,摩尔人及基督教徒舞(*Baile de los Moros y Cristianos*),是一种征服舞,则由管笛和皮鼓伴奏。本文论证的是:一个已经失传的后古典时期基切族战士舞元素被纳入由西班牙引进的摩尔人及基督教徒舞之中,这种同化包括了共同的主题元素,如征服和战争的准备,以及伴奏乐器的配置,即管笛和皮鼓。这一理论采用词源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加以论证,并使用了听觉和视觉元素。

[波兰]安娜·格鲁斯茨詹斯卡—祖瓦科斯卡
模糊的音响与图画:在纳斯卡艺术中激活感官

根据安第斯传统,音响类型是音乐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仅凭乐器的声响,人们就能判断出它所演奏的音乐的文化起源。安第斯音乐不是独奏的音乐,其声响是不稳定的,通过分析,我们能看出其频率上有特色的起伏。这种由纳斯卡乐器体现出的模棱两可,可以与纳斯卡的视觉艺术相比较。比如说一些纳斯卡哨子(模仿动物),其他乐器的装饰,还有纺织品上的色彩和形式的形象。从纳斯卡艺术家对人类感知活动的强调中,我看到了双重意义或模糊性的原因。均衡音响或视觉的力度,在激活人们感知中,比那些固定的更优越。

[意大利]罗伯托·梅里尼

庞贝的“声景”:通过声响的/音乐的证据的地理参照重建其音响空间

如 R. Murray Schafer 在其研究中阐述的(*The tuning of the World*, 1977),“声景”(soundscape)这一概念立即让人联想到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事实在对大多数人居住的喧嚣之地——城市——进行的研究当中也不应该被忽略。参考古代历史的文化成果,城市的“声景”是更难捕捉的,因为其音响的出现大多不是同质的,而出现的背景又相互交织。在当前的研究条件下,只有一个例外似乎避免了这些限制:庞贝。

众所周知,这座罗马古城在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当中毁灭,但是地面以上部分已经被完全复原,而其地下遮掩部分(在整个城市占相当大的比例)非常适合致力于对其社会生活的达到有机理解的研究(比如维尔罕米

那·雅舍姆斯基对其花园的研究和帕纳洛佩·阿里森对其房屋的研究)。本文首次对庞贝的“声景”整体做出研究,从与声音和音乐有关的器物 and 图像的地理方位开始,再将这些丰富的实证与整体结构联系起来。其成果可以用来重建古代市民的音响范围,并解释它们与当下的联系,间接说明古罗马时期声响/音乐的体验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台湾]赵琴

音乐、考古学和当代作曲、表演艺术:遗产与未来之间的价值

“音乐作为一宗文化遗产”是个关键句。作为文化遗产,音乐的使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通过对音乐博物馆里藏品——比如乐器和画作——的应用和解释来丰富我们对于过去的人类和文化成就的知识。笔者将讨论以下 3 个案例。

1. 曾侯乙墓中运用乐器进行的音乐创作。曾侯乙(卒于公元前 422 年)墓于 1978 年在中国湖北被发掘,其中有大量的乐器面世。本文挑选出大型编钟合奏在现实演奏中的使用,还将介绍为舞蹈和合唱而作的新的作品。

2. 绘画所引发的经典音乐创作,韩熙载夜宴。这幅著名的画卷是对唐代服饰、音乐、舞蹈和插花艺术的详细记载,由汉唐乐府配乐,成为了宋元时期十分受欢迎的南方音乐。

3. 敦煌飞天壁画所引发的舞蹈作品。飞天壁画精致而独特,是来自梁代的最早的壁画。

本文将着重于音乐的风格,强调主题:来自过去的声音,并讨论遗产与现实之间的价值。附录包括具体的参考文献,如关于乐器和绘画的录音和影像,笔者也将播放受这三个案例启发而创作的音乐。

[埃及]里姆·F. 沙克威尔

古代埃及音乐与现代音乐之间的延续性:竖琴和长笛(Nay)的演奏技巧与暗示

音乐家与他们的乐器有着特殊的相随一生的关系;学习一种乐器的时间可能长达十到十四年,而一个艺术家可能在其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长时间的演奏这种乐器。

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规定了艺术家与其乐器之间物理关系的法规则上的,我们称

之为方法或“技术”。

在古埃及,特别是在负责音乐教育的古老的王国庙宇里,乐器演奏技巧是神圣而独特的知识,因此它有自己严格的演奏规则和大量的曲目,这些都是学习者必须背记的。这些曲目包括大量以书面和记忆形式固定下来的标准曲目。

今天,我们有了许多教授表演技巧的学校,比如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和俄罗斯的;每个学校对于某个乐器如何演奏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观点。

本文将讨论古埃及时竖琴和长笛的演奏技巧,其与今天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以及古埃及技巧对当代学校在这两种具体乐器上的影响。

[中国]贺志凌

新疆出土箜篌——中国的古代竖琴

“箜篌”是古代竖琴在中国的称谓。中国有关箜篌的记载始自汉,历经各代一直到明清,屡见于史书及文学作品之中。由于没有考古标本出土,有关这种古乐器的研究一度建立在文献和图像等资料的基础上。直到1996年,中国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且末孔雀河墓地发掘出土了3架箜篌,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是中国音乐考古界第一次目睹这种古老乐器的真实面貌。2004年,鄯善洋海墓地又出土3架箜篌,将其历史推进到公元前7世纪。

发掘简报直接称箜篌为竖琴,这在乐器指向上是相同的。但是箜篌与现代竖琴无论在型制结构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是大相径庭之物。确切地说,新疆出土箜篌是古代竖琴在新疆的地方化产物。这6架箜篌,在制作材质、型制结构、比例关系以及蒙皮方式上的相似性,和局部细微的差异性,说明了两地箜篌在同源关系的基础上所具有的地区风格和发展演变因素。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巴泽雷克古代竖琴是与新疆出土箜篌在时间、地域及型制结构上最为接近的实例。而型制结构和演奏方式上的差异又凸显出两个竖琴亚种的不同。在竖琴由西亚至新疆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斯基泰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基泰人的迁徙之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分为东北、东南两条支路,这两条支路的终端,分别是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和新疆的准葛尔,这也正是巴泽雷克竖琴和新疆出土箜篌的所在地。

[德国]奥利弗·福格尔斯

作为音乐器物的岩石艺术:在当代音乐文化和班图人扩张里解读史前绘画中的乐弓

南部非洲被认为拥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史前岩画。现存的对于绘画、雕刻和考古学田野考察的文献(主要由科隆大学史前研究所自1963年开始执行)揭示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间(石器时代晚期)在北纳米比亚(非洲西南部)的岩画。

尽管目前在非洲南部尚无关于乐器的考古发现,但是这些在文化上具有极高价值的岩画也是一个音乐考古研究的优良的数据库。通过对岩石绘画的考察,作者能够展示史前狩猎聚居音乐文化中运用乐弓的例子。一种系统的方法帮助笔者找到了许多迄今未知的演奏乐弓的图像。

通过对当代班图、科桑和桑族人演奏技巧的比较,区别对乐器的描绘和形态上相同的狩猎弓的描绘成为可能。岩画的内部结构使笔者有可能去理解乐弓演奏的文化背景,这显然与狩猎有紧密的联系。另外,考虑到岩画在北部纳米比亚发展的时间区段(早于班图人扩张时期),它很可能为自史前时代起南部非洲的乐弓和其文化迁移的史料编纂提供线索。

[责任编辑:吴晓丹]